

雷波文史

第

3

期



雷波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19

9/ 辛
年

0
月

1
日

目

录

总字(第八期)

1. 知史明智,爱我中华.....李本科(1)
2. 鸦片逼得他流离失所.....熊尔批口述
(7)
唐玉鲁整理
3. 雷波禁烟概况.....魏吉民、杨文思(9)
4. 烟毒给雷波人民带来灾难.....张益俊(12)
5. 瓦岗地区戒烟情况回忆.....苏子鲁口(16)
6. 拾得白银九铤交公的好学生.....阿鲁黑格(18)
7. 麻咪泽开拓概述.....马曲博(19)
8. 汶水三纵队进攻县城始末.....余远怀口述
(22)
余忠涛整理

(注,第四期3页15项的徐^兴钰更正为徐兴全)

知史明志 爱我中华

李本端

鸦片，植物名称叫罂粟，原产欧洲。经炮制称为鸦片，俗称“大烟土”。可入药，提神解痛，但久吸易上瘾，消耗人的体质，麻痹人的意志，是一种麻醉品，一种毒品。记得曾有一出杂剧，其中形象地描述鸦片的危害：“鸦片烟，真狡狴，这是英国要将中国害，远从印度运来，将一座好神州，化作烟世界；一方好田地，尽将罂粟种；一个好人家，尽将烟器摆；一条好花街，尽将烟馆排；女人变成妖怪，男子成痴呆；未老身先死，已死身不埋。”

鸦片何时流入黄琅，何时开始种植，无文字记载又无史料可查。笔者采访黄琅耄耋老人，他们讲在清朝末年开始种植。民国年间种植、贩运、吸食比较普遍。国民政府时禁时种，断断续续种到解放前夕。少数边远地带种到黄琅解放那年（一九五〇年）有人记得还划了二刀才解放的。现就民国时期黄琅地区鸦片种植、贩卖、吸食情况略述二、三。

种植情况：从清末开始种烟后，到民国初年黄琅所属各地普遍种烟。国民政府行令禁种时，不敢公开种植。个别人迹罕至的偏僻地方也有人偷种，如发现也得追究。由于禁烟有时紧有时松、有时放任自流，视而不见，有时采取收税认可的恶腐行为，所以大量良

田种烟不种粮不足为奇可叹！烟税是由基层地方政府向雷波县政府包下来后，再由地方组织人力征收。黄琅曾有“八人团”负责收烟税。其成员有朱治盛、朱治馨、杨子云、杨家文、杨子贞、李为栋、张敬臣、胡济泉。最初收烟税比较轻，以自报为主，后来到地里看烟苗估产登记抽税。有段时间参照同生垦殖公司的办法，到地里看苗价分甲、乙、丙、丁四类点烟窝登记，每一万窝甲等交80两，乙等交60两，丙等交40两，丁等交20两。人民大众叫苦连天，有交不起的被乡丁拉去关押迫交，抗拒不交遭毒打的也有，有时保甲长催收不力受打骂的也有。官迫民反，民国八年下雪弹子，把将要划的烟苗打坏，群众要求减免烟税，当时驻黄琅收烟税的冷××委员没有同意。愤怒下，数十名群众打了冷委员，后被黄义公袍哥大爷姚兴发保护起来事态才未扩大。

官场中视抽烟税为发大财的好时机，朱治盛任黄琅乡长时，同生垦场岩峰分场鲁俊波种大烟扩至翼乐坪、喜窝洛一带，侵占了地方利益，实质是个人利益。为了协调这一问题，朱治盛组织地方绅士、袍哥等人亲自去岩峰坪协商收税。结果仅到翼乐坪胡炳州（保长）家协商。提出多种方案协商，均未达成。鲁俊波发火说：我有力量种，就有力量收。何须劳驾你们来收？如硬要来抢收，那在枪尖上来收。协洽小组见势不妙，张敬臣发言调和说，今天不早了肚子饿了吃饭，吃饭。协商不好，以后再说。于是在胡炳州家吃罢饭各自返家。

黄琅地区大型铲烟活动有两次。宣统二年由县令陈廉率队来黄

铲烟。行至较场坝受到徐境裁组织群众阻击，陈逃到张家月母子床下躲藏幸免遭打。将铲烟工具扔到烂包沼泽里。有人编诗讽刺，其诗内容为“宣统元年半，陈大老爷落了难，不是张家月母子，要吃人民尿沙罐”。这次铲烟未遂，后来徐受到处理。第二次是民国三十六年（公元一九四七年）主妥铲同生垦场的大烟。执行任务的是中央军七十九军下属两个团，黄良团长进驻黄琅，王卓如团长进驻蛮溪口（柑子乡）来时在屏山县冒水乡手爬岩受到穆凉洲的场兵堵击未能进入。后部分队伍绕道从云南至擦尔岩用大炮轰垮手爬岩后才分兵进入柑子和黄琅执行任务。小铲是由县警察或区乡民团执行。马湖魏明德摆谈，有一次县里来马湖铲额子沟彝族所种鸦片烟。任务交由马湖地方上执行。接受任务后相当棘手。不去铲怕县上说包庇种烟共同得利。去铲必然得罪罗额石土（彝族、当地头人），今后马湖的安全将成问题，真是两难。紧急关头有人想出“上策”，派联络员暗通罗额石土协商，明铲暗不铲，暗混过关，欺上交差。因铲烟正是匀苗之时，即匀去病弱株若干然后定苗。暗商定，铲烟人去时彼此朝天鸣枪，你们退却，我们将匀掉之烟苗背回马湖街上交差。走时你们又出来朝天鸣枪，同时吼号子以示追逐我们。从这次铲烟经过，可略见官场铲烟的态度了。

销售贩运情况，对鸦片时有销售市场，在街上设烟行置公称。凡已成交的烟均拿去行里过称，并贴上标签，由卖主交百分之五手续费。在普种鸦片的年代，每到农历四月，外地烟帮、烟贩、

小百货商人、五二布和仁寿土布商纷纷来到黄琅赶烟会，黄琅又热闹起来。有的小商贩流动到烟地叫卖，划烟饿了的人，随手携一沓烟可换饼子三封，那又是别具一番风趣。有个别烟帮或二哥（抢人的）暗地拿枪弹换大烟。有时鸦片当作市场上的流通货币。烟帮或烟贩买到烟后，随即运至云南^省绥江^县、宜宾、乐山等地出售。如烟帮硬（有军界或地头蛇合伙）要时也私运到重庆、武汉、上海等地出售。每次赚钱不少。但有时被禁烟队查获收缴，有时遇土匪抢劫一空，惨痛返回。如烟帮的硬火多，遇上二哥队，括龙（相互打起来）之事时有发生。有的带伤、有的归西天。如一贯抢人的头目巴管亭在一次抢烟中被人打死。鸦片烟之害可想而知。

鸦片烟的价格历来昂贵，那时每两可卖白银二、三两。白银一而又可换大米五十市斤。笔者一九四八年在宜宾读高中时，曾拿过一两二钱烟膏子（烟枪和烟斗里挖出的精华）到宜宾请同学的父亲变卖后，足够一期各种费用。（一两烟膏的价可当三至四两生烟的价）。

吸烟及其危害：前面杂剧里有“一个好人家，尽将烟具摆。”吸烟的人必须先备烟具。煮烟的铜锅（大多用铜瓢代用）、装熟烟的盆或盒，烧烟用的烟盘、烟灯、烟枪、烟钎等。官僚绅士和大户人家吸烟，除了主人有吸烟床外，多设有吸烟客床。两套烟具必备全，如此，举目各处均是烟具。一个好端端人家，有一、二人吸烟，这家人的起居饮食、正常规律将会遭到破坏。吸烟上

瘾的人多数是吸到深夜二、三点钟。一般人家、贫苦下力及流动人吸烟，则到烟馆里去吸。山清水秀、群山环抱的黄琅，有上街、下街、正街、横街。小小四条街，却有烟馆十五、六个。这些烟馆的主人是李义方、李在林、李友伦、何彦敏、方万昆、黄元旗、王柏林、李庭弼、吴光藻、陈荣光、杨春松、何彦如、杨家焱、杨家油、刘兴告、李在荣。正是杂剧中所言“一条好花街，尽将烟馆排”。不仅街上有，城里和乡间（柿子树弯、埝口）也有几个烟馆。（注黄琅的街在城外）

吸烟上瘾数年的人，脸色苍白，体质瘦弱，精神萎靡，气质日衰，肩不能挑，背不能背，丧失劳力，成为社会废物，人称“烟鬼”。解放初期有这样一句流传话，“旧社会好人变成鬼（烟鬼），新社会鬼能变成人”。这话的实质是人民群众对旧政府禁吸鸦片政策的评价。旧政府禁烟不坚决，时禁时不禁，时紧时松，有些人吸烟上瘾变成烟鬼。新政府禁烟态度坚决，措施果断。不管是多年的老烟哥瘾再大都能戒掉。使一些人恢复健康，成了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一些成了劳动致富能手；有的当了人民教师，从而过着美满幸福的生活。笔者在黄琅采访十余人，收集到受鸦片毒害的人不少。如刘发举因吸烟上瘾，成了街上编谎出名角色，一次想拿妻子的东而卖来吸烟，因妻子看得紧管得严没法拿着。一天晚上他哄妻子一同去罩鱼，叫妻子打火把，回家后发现被子、垫单不见了（是刘先的烟友来拿走的）。周绍华因吸烟将瓦房六间出卖给赵光明，全家打飘飘。商光清吸完手里钱财后没办法了，

只得将土地租或卖给别人，基本整光田土。罗贵兴全家大人都有烟瘾，把钱财、家具、房屋、田地吸光，将好端端的、美满幸福的家庭吸垮。（此人原系国土司家的管家，比较富裕）。蒋益洪吸烟致贫，无钱娶妻，只得出卖已开庚的刘姓姑娘的庚帖给李为全。（民国时叫“卖红庚”）。邓××吸烟上瘾、赌博成性，家母阻不住，亲友劝不了，继续吸烟赌钱。整完钱财后，实在没法，最后逼得卖妻子。买者来接人时，幸得范修品等人出面阻止来遂。严文君（民国时任过黄琅区长）的儿子严树容因染上吸烟恶习，瘾大丢不掉，体质下降，疏懒成性，学不成才，家庭加压，社会舆论，结果跳水自杀。猪子坝（谷米）沈序金因吸烟后无办法，便偷粮食、猪来卖，因惯偷著名，各自提防，在没法偷到时，烟瘾来登时，拿枪自尽，据说其父也是上吊自杀，造成家破人亡，令人深叹。吸烟危害，彼彼皆是，枚不胜数，不再赘述。

近年把黄色书刊，不健康的影视、录像比作鸦片，不无道理，引人深思……。党和政府把贩毒吸毒列入“六害”之一予以打击，这是大得人心，大快人心之举。谈及鸦片这种毒品时，人们总会想到一百五十年前发生的那场鸦片战争，想到当时帝国主义者是如何以枪炮军舰在我国强行推销鸦片的五行。想到《南京条约》、割地赔款、五口通商。炎黄子孙受知史明志，爱我中华，建设中华，实现四化。今天除了那些吸毒者，是谁也不欢迎这种鸦片的。然而现在另一种“鸦片”——“精神鸦片”，却在并无枪炮轰鸣的情况下不断流进中国，给善良的中国人民造成损害，特别是青少年受害更大。万万不可掉以轻心。

鸦片逼得他流离失所

熊尔批 口述 唐玉鲁 整理

吸鸦片上了瘾的人，多数人被鸦片害得走投无路，被逼得流离失所。我们千万贯乡水口村的张阿沙就是我耳闻目睹的一个铁证。

张阿沙兄弟四人，他是老么，结婚分家后有房屋三间，土地28亩多。按理说，身强力壮的两夫妻，勤锄苦耕，正常年景，生活是过得可以的，但他在民国二十八年开始吸上了大烟，并一吸就上瘾，从此他如象被魔鬼缠住了似的，渐渐地就日薄西山了。最初，他把家里的钱拿去买鸦片花光了，就卖猪、牛、羊，并把卖来的钱拿去买鸦片来吸。三个哥哥语重心长地劝他：“阿沙象你这样吸下去，会败家的，后果就不堪设想了啊！望你戒掉它，戒了鸦片，对你各方面都有好处”！他当成耳边风。长兄们虔诚的忠告，对他无济于事，他爱人善言相劝：“阿沙，把吸鸦片的钱用去买些好吃的东西，还能补身体。如把吸鸦片的钱，制些穿的，穿着漂亮的衣服，人都显得有精神。我求求你，不要吸那个毒品了吧”！他听了大发雷霆地怒吼：“老子不吃不穿，我就离不得这口鸦片烟。我就是要吃，你把我咋个样？彝族有个规矩，女人嫁给男人，嫁树随树，嫁石随石”；他把好心的妻子之话，当成恶意，贤惠善良的妻子只好背地伤心痛哭。他不但不改，反

而变本加厉地吸他的鸦片。

俗话说：“坐吃山会空”。他家的猪牛羊卖来吃完，就卖土地，一亩二亩三亩的卖掉，最后二十八亩多土地全卖完了，也满足不了他吸鸦片的奢望和需求。他爱人泪水往心里流，她逢人便流着眼泪哭述：“我家那个败家子把土地卖光了，今后全家怎么活呀”！被鸦片迷住了的张阿沙，根本谈不上什么夫妻关系了。背着妻子，把他的老婆卖给了人，把卖来的钱又用来吸大烟。他孤注一掷又把房屋也卖来吸了鸦片。他变成了光棍一条。

民国二十二年，张阿沙被鸦片害得骨瘦如柴，走起路来一步三叹。腰光半文，无脸见亲友们，只好离乡背井，流离失所，过着颠沛流离的乞丐生活，乞讨到甘洛去了。

阿沙的悲剧，是英、美、沙俄等帝国主义，把毒品鸦片输入到中国酿成的。鸦片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灾大难岂止是张阿沙一家啊？鸦片的毒液漫流中国大地的历史怎么能忘记？

雷波禁烟概况

魏吉民 杨文思

(一)

民国时期，禁烟立法，凡三改均无禁种条文，致于民国十六年（1927）间，雷波烟税上缴额为法币1万元，这主要是种烟户交纳的“青苗捐”，继之运售征收印花税，烟馆吸户征纳“红灯捐”等等，是谓之“寓禁于征”，最后颁行的《禁烟法》规定，对烟犯的处刑条文，等条都没有罚金附加刑。

民国二十五年雷波近县城的区乡确也实现了禁种，后因同生垦社，大同、抗建等垦区广为播种鸦片，县属黄琅区与垦社耕地相邻接壤的民地也相袭暗行种植。至民国三十五年（1946）国民党乐山第五区行政督察专员刘仁庵亲赴雷波指挥，并与县长李四荣就黄琅种烟区督令铲除烟苗，各地互有贿赂交涉，独同生垦地竟行武力抗铲，并鸣枪向刘示威，李县长、刘专员共谋，具文上报同生垦社抗铲恶迹，由李县长直走重庆行辕请具剿办，行辕令79军方靖部调兵执行，民国三十七年（1948）方部副师长朱济猛挥军直扑同生垦社场部柑子坪，董事长穆羸洲集金垦社兵力抵抗，一战败北，遁入马边。

经这一场军事行动，垦场畏悚，县属民地也不敢再行种烟了。

雷波县府为了表彰永志国军查铲烟毒功绩，按军方以军长方

靖(字海濂)，副师长朱济猛以下团级官员，政方以专员刘仁庵等人的名讳为黄琅区查铲烟苗的乡镇命名，菁口改称济猛乡，马湖为海濂乡，渡口为黄梁乡，岩风坪为仁庵乡。

朱部军事任务完成后撤军，同生垦社复业，更名复兴垦社，种烟一复如常，民地种烟则转入彝区。后任县长刘少华相继查，用兵各地，再起烟贿争端，稍事拒贿，刘便如以“叛彝”罪名，大行剿扑屠杀，麻柳湾、水口坝先后频遭兵劫，伤亡甚重，并索赔大量兵费。彝人吴奇支感其势力区失利严重，集兵抗刘，发生激烈战斗，刘部警察中队长邵昆洲阵亡，刘少华也至精疲力尽，只得收兵。

雷波彝汉杂居区实现了鸦片禁种，彝族聚居的地方鸦片则大有发展，国民党雷波县政府也号令禁运、禁售、禁吸，但这只是“公开的秘密”，官吏军警无不以经营鸦片图利，运、售各显神通，“弱肉强食”，盗匪风起，杀人越货之事曾出不穷。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新任雷波县长杨晤依到任途经黄琅向乡公所借钱开支差旅费，乡公所借给鸦片80两，杨领得力资，以鸦片1、2两沿街乞售，警察局却以“烟犯”罪名将其拘押，这是违犯“公开的秘密”之一例，致于秘密进行运销的那怕是十担百担也不犯法。

(二)

解放后雷波县人民政府大张旗鼓地开展禁烟禁毒，宣传动员群众清缴鸦片，自1950年9月至1951年10月雷波公

安局即收缴了二万余两，并于当年的“十一”国庆节分别于县城、黄琅、永盛等地当众烧毁缴获的鸦片，在全体人民心目中树立了威信，并体会了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禁烟禁毒政策法令的严肃性，彻底性，令出必行，一丝不苟的精神。

人民政府为了根治、禁绝鸦片，于1952年又开展了一个群众性的禁烟禁毒运动，在乐山专署禁烟禁毒委员会的布署下，同年7月28日“雷波县禁烟禁毒委员会”（办公室设公安局）成立，县长张义臣任主任委员，公安局长梁克敏任副主任委员，民政、团委等部门为成员单位。禁烟禁毒措施是：一、各区限于一个月内存清瘾民，集中禁吸，定期戒除。二、以区为单位清查烟犯，对犯有法定罪行的，由禁委会上报批准逮捕法办。雷波县人民法院于1952年11月14日在县城公判了16名烟毒犯罪分子，并对屡教不改的烟毒严重犯罪分子李义轩执行了死刑，千余群众参加公判会，并受到了一次生动的法制教育。

为贯彻执行党的“惩办与教育相结合”的政策，在禁烟禁毒运动中，在全县各区乡同时召开了群众座谈会、公判会30余次，接受教育的成年群众达5000余人次（按当时开展运动区的人口总数约四万余）同年底县公安局相继缴获了鸦片12832两。禁绝鸦片收到了良好的效果，至1954年鸦片烟毒的禁种、禁售、禁吸，除少数犯罪分子利用社会散存的余毒暗行运售外，雷波县基本消除这一历史性的流毒的危害。

此稿责任编辑杨忠华

烟毒给雷波县人民带来灾难

张益俊

中国历来就是一个富强康乐的国家，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以后，列强侵入中国割地赔款订立辱国殃民的不平等条约，外国人贩卖鸦片的罪恶行为，严重地破坏了中国法纪，并毒害了中国人民的健康。中国受害的人不下两百万人。中国的白银大量向外流。引起银价剧烈上涨，大大加重了农民手工业者的负担。烟毒泛滥对军队和官僚机构加速了腐化。已实现了林则徐说的“鸦片进入中国后无可用的兵，无可征的粮”。

“烟花三月进凉山”，凉山的良田美地，遍地芙蓉，(鸦片别名)代替了粮食，导致外省大批商人庸(君)集雷波，造成雷波的灾难。不论男女老少、仕、农、工、商、学兵各阶层，都重视鸦片，轻担粮食，饥不可食的现象摆在面前，而大部份人(主要是男人)都吸上了烟，不管有事无事，有钱无钱，吸烟比吃饭还要重要。当时的城镇市场，烟馆林立，三朋四友相会，都以进烟馆吸大烟，靠烟盘，吞云吐雾为乐事。因而社会上，不论租佃房地，买实地方，雇请工入，会客、交朋、打官司、告状、写状字，出契约、托人办事，都把进烟馆，吸大烟作为交换意见、而议大事、完成任务的合法场所，一些青年开头吃便利，吸上了瘾，偷东卖面，当衣服，卖财产，甚至卖妻儿子女，整得家破人亡，

自身吸得枯瘦如柴，生活无着，骗人骗己，当陀神（下流的单身汉）白走街头，夜宿古庙，夏喂蚊虫，冬靠炉子，可怜的惨状实难形容。当时的社会，有女之家要找一个不吸烟的男子都很难。抗日战争中，雷波按规定每月应征壮丁30名一年360名，可是抗战八年，连一年的兵额都征不够。从前雷波有一位老先生写了一首《西江月》单道鸦片之害云：

“外人贩卖鸦片，流毒中国有年。或男或女被它缠，像形十分难看。房屋田园卖尽，基业渐渐凋残。妻儿子女受饥寒，图使后人嗟叹”。

这充分说明鸦片之害，遭到家破人亡之惨，政府为了挽救危机，不得已制定有关禁烟条例，可是“龙头蛇尾”没有从根本上去解决，因而执行中花样百出、无奇不有。在对吸烟者有两种办法：其一是以严刑拷打为主，其二是强身卫国以教育为主。不管清政府和民国政府的执政人员都不是真心实意禁烟，他们往往从中取巧、狼狈为奸、官僚土劣，以开垦为名，大种鸦片，军政要员籍剿办为名受纳鸦片，以收税而发动战争，以立法违法是他们的特权，现将有根有据事实简介：

一、对待烟犯，道光年间禁烟政策雷厉风行，吸烟者逐户清查，查出后，或戴枷、或打入囚笼（囚笼有坐笼、占笼、吊笼）吊笼是木料做成的方形木架，顶端留一个洞恰恰能容一人的颈子，把犯人的颈子锁在洞中，身首悬空，上无物可依，足不沾地，时间不久，人即死去，刑虽严，但个别富户人家，特制能容一人

和烟具的大木柜，人在柜内吸烟，外面把柜锁了，很难识破，民国相沿用体罚，典型的如民国29年新编十七师驻军营长陈昆山，对烟犯动行吊打，整得九死一生。执行法令较好的如民国23年驻军第五师十四旅四十团二营营长杨治安，教民有方，采用强身卫国的方法教人民群众，每日晨早都到东较场集中锻炼，迟到者，罚以劳工。同时协助政府和平夷楼开办戒烟，把烟民集中吃药戒烟分批进行。

二、以开垦为民，大种鸦片。民国20年有离任县长马冰源办那古坝垦场，民国24年川南剿匪军边防二路司令穆瀛洲办同生垦殖公司。民国33年国民政府参军吕超的侄子吕镇华办抗建垦社，宜宾县长办大通垦社，绅士刘亚孙办上坪子垦社，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傅因民办菖蒲田垦社，县参议长郭淡如办锦屏垦社，还有大生垦社，永盛垦社、罗汉坪垦社、中心垦社、义民垦社、新民垦社等都是官僚土劣们在县境内大发洋烟财的勾当机构。

三、以剿叛为名，收缴鸦片挑起民族斗争破坏民族关系的民国8年四川陆军第八师第二混成旅文队长冷寅东进兵小沟、母猪坡、马颈子、三棱岗。民国19年24军屯殖军25团团长王林生进兵马颈子、谷堆。民国35年至37年县长刘少华先后数次打凉山，彝人被迫投诚交纳大烟和白银，官兵胜离雷，彝人则四乡出掠、捆掠、烧杀，人民昼夜不安，形成官兵进、彝人退，官兵退、彝人进，循环不已，由此民族仇视日益增加。

四、以收大烟税而惹起的战争，民国八年挺进军疗月江部下

管长疗少清率众到中山坪征收烟税，任意~~拉~~索，引起彝人反感，群起攻之，疗少清败走后，到屏山向疗月江汇报，疗月江纠集金沙河下游绿林围攻雷波县城遭受严重损失。又四川省第五行政督察专员刘仁庵两次向同生公司收烟税未获报经省府同意派陆军79军方靖所属88师师长向敏思率团长朱济猛、黄梁二个团的兵力攻打柑子坪、黄琅、海濂、菁口、岩峰坪等。

五、制法犯法对鸦片禁种、禁运、禁吸、禁止贩卖、禁严的法律是政府制定，可是他们是只准“州官放火，不准民间点灯”刘仁庵收烟税已犯法不究还派兵剿办，从清朝就形成制法犯法，据雷波厅志城也卷之七载“黄琅巡检司沈彬绅士徐星汉请准就地征收烟税改造黄琅石头城”。民国24年雷波税收项目载，禁种、罚金、烟灯罚金，每一灯日出铜元400文。内销罚金每一千两鸦片出售应征税银120元。